

“体育迷”邓小平：中国也要举办奥运会

邓小平是著名的体育爱好者。从足球、游泳、登山，到桥牌、棋类，长期坚持体育运动给了他强健的体魄。同时，他对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恢复奥委会席位

1958年，国际奥委会在某些人的操纵下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毅然与其断绝了关系。1974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分管的部门中就有国家体委。他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对国际奥委会要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方针，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正是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于1979年10月25日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84年10月，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对我说，中国能参与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世界性体育大赛，大幅提升了中国人的尊严。”在萨马兰奇的记忆中，那一天邓小平非常高兴。

那年8月，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一

鸣惊人，夺得15枚金牌。警卫张宝忠记得，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但凡有比赛转播，他场场不落，“兴之所至还会给体操和跳水选手打打分数”。张宝忠说，从电视中看到萨马兰奇将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小平同志非常兴奋”。

“要把体育搞起来”

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邓小平曾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奥运会）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我们）要把体育搞起来。”

中国也要举办奥运会，是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分管体育工作时就提过的想法。

邓小平也是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领导人。1990年，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参观刚落成的亚运会田径场和游泳馆。走在高架桥上，他对伍绍祖和张百发说：“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91年2月26日下午，中国奥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

申请。很快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奥申委的报告，北京奥申委宣告成立并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991年12月，在国际奥委会总部瑞士洛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代表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递交了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中国的申奥之路曾遇挫折，但终迎成功。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

曾典当外衣换球票

生活中，邓小平爱足球、懂足球，是个地道的球迷。这一点，从他早年留学经历就可看出端倪。据说有一次为了看足球赛，他竟把一件外衣典当了换球票。1924年，法国巴黎举行第八届奥运会，为了观看足球比赛，邓小平不惜拿出生活费来购买球票。

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5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最高，连球都看不清楚。”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邓榕描写过父亲爱看球赛的习惯：“解放后，他一直是足球的热情观众，有球必看，



正在看球的邓小平(左一)

连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不但他自己去看，还带着我们去看，看不懂也要去。我们小时候就大半坐在休息室里喝汽水。慢慢地大了，也都成了看足球的‘瘾君子’了。”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一如既往地热爱足球。而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在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中，有两次复出都是通过足球场发出信号。这是邓小平与体育不解之缘的生动体现。

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幕，出现在1977年7月30日。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在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距开赛还有几分钟时，主席台突然掌声骤起。8万名观众不由得站起来，向主席台方向翘首张望，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声如雷。原来，是邓小平来看球赛了。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一刻，欢呼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以后的岁月，中国的命运将和这位容光焕发的老人紧紧连在一起。 武春霞

柳青“坐”出《创业史》

1952年，作家柳青为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来到陕西长安县挂职体验生活，长年住在一个叫皇甫村的村子里。到了1956年，柳青还没拿出一部作品，文艺界就有人议论说，“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怎么在那里坐得住的”。在全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点名批评柳青意志衰退，并且预言他的创作将会失败。当地的领导也向柳青表示，要是拿不出作品，就不要再待下去了。

一位朋友来访，跟柳青说：“人家都催你走了，你真能够坐得住啊？”

柳青笑呵呵地指着院子草堆上正在下蛋的母鸡说：“它坐在那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去打扰它，要么生不成蛋，要么鸡飞蛋打。”

柳青不着急，他继续在皇甫村体验生活，为了熟悉集市上牲口交易情况，他和

当地买家一样，在凉帽里、袖筒里，不动声色地捏指头讨价还价，他的装束和对市场行情的了解，“蒙蔽”了很多生意人。为了写好一个饲养员和牲口，他常常在牛棚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有一阵子，他有规律地在半夜11点、凌晨2点去观察牲口在夜里的表现。

日积月累，一段段生动细腻的描写跃然纸上。1959年4月，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开始在《延河》杂志连载，一时杂志脱销。第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出版了单行本，《创业史》被文学界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

时间没有忘记柳青，60年后，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中，《创业史》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这个荣誉，再次证明柳青当年的勤奋与执着。 俞继东

400万年薪难阻溥仪皇帝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猛烈抨击。面对谴责之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一个中国人做傀儡，把国际事务敷衍成国内事务，希望以此平息国际上的批评之声。日本人选来选去，觉得还是溥仪最合适。一是溥仪当过皇帝，威望高；二是东北是清朝入关前的老家，群众基础好；三是溥仪不是军阀，没有军队，好控制。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如坐针毡，想用“每年400万银元”的优抚金和溥仪达成谅解和交换，希望他不要去东北。可是被日本人成功游说的溥仪，此刻想的只有江山，便一口回绝了蒋介石。1931年11月11日深夜，溥仪从天津奔赴东北，开始了他不光彩的一段人生。日本人只想拿他做个幌子，以便应对国际舆论。当溥仪到达东北，提出要接着做皇帝的想

法时，日本人对他撂下了狠话，要求他只能当共和制的国家元首。

双方僵持到最后的最后是选择了一条折衷的方案，即日本人同意了溥仪方面提出的先当一年“执政”，然后再当皇帝的想法。在这笔交易完成后，溥仪带着几许被玩弄、欺骗的不满之情和满腔恢复祖业的野心，携妻带妹地来到长春。那一刻，也许溥仪真的想过要把根扎在这片祖宗的隆兴之地吧！

溥仪的贴身侍卫李国雄回忆说：“1932年3月8日16时，溥仪携婉容还有他的几个妹妹来到伪执政府临时驻地。那天晚上，溥仪太忙了，人来人往不断。我本想靠前说说这几天的情况，竟找不到机会。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晚上，溥仪并没有睡在给他预备好的两间居室内，而是住在典礼大厅东边的一套房间里。” 张贤达

张爱萍坚持自主研发秦山核电站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拟建设两座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浙江秦山核电站。按照规划，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外合资共同建设的，由于有效地利用了国外技术和资金，整个项目预计效益极大。正因这种情况，当时的主流观念分两类：要么干脆放弃国产的秦山核电站，要么让秦山核电站一起接受外国投资和技术。

1981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讨论中国核电发展的问题。关于核电站的建设发展问题，也不是第一次讨论了，只是一直没能讨论出个结果来，有人觉得就应该自己搞，有人觉得引进技术就行，没必要花大力气研究。

这次会议，张爱萍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也参加了，搞过那么多重要国防工程，他当然力主自家的核电站自家造，通过摸索建设秦山核电站，来发展好我们的核电工业体系。在会议之前，他把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关于建立中国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的报告转给了国务院主要领导。

在进行汇报时，张爱萍提出，中国的核工业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外国人。即便秦山核电站最终效益少点、规模小点，它对我国的核工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能因为有更好的外资就把自己的东西抛弃掉。由于与会者各持己见，争论十分激烈，张爱萍大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坚决要尽快建设秦山核电站，自主研发。

会后不久，邓小平单独找张爱萍谈话，原因是有很多人反映张爱萍有时不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此，张爱萍坦诚地说，和自己有关的会议都会参加，这些基本是国防科技方面的。至于文化、体育之类的会议，自己不太懂，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索性就不参加。在谈话中，邓小平直言：“都说军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是一个，你是个硬骨头，这点我知道。你能力强，但是也要注意，要做好表率。”面对邓小平的批评教育，张爱萍虚心接受。

不过，邓小平对张爱萍还是十分认可和信任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张爱萍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要职，成为唯一一个担任过新中国国防部长的开国上将。 水新营